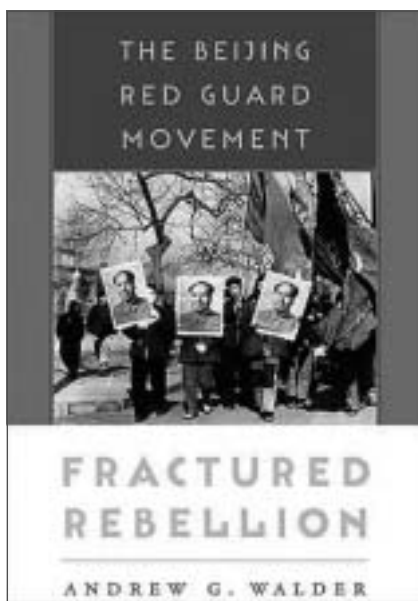


一個西方社會學家眼中的紅衛兵運動

● 董國強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因其捲入人數多、持續時間長、造成危害大，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最引人注目的歷史現象之一。

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最初起源於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關的「文化革命」。那麼一次旨在淨化意識形態的努力為甚麼會轉化為一場政治清洗？又如何由黨內高層紛爭轉化為一場全面的社會動亂？要回答前一個問題，我們必須研究大躍進運動失敗以來的中共黨內精英政治，了解毛澤東的性格特徵和執政方式。要回答後一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從社會史的視角切入，解析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架構，了解「黨的領導」的實現方式，明瞭中央的文革號召對億萬普通民眾意味着甚麼，以及人們如何主動或被動地在這場運動中扮演某種角色。作為廣泛的群眾社會運動的先導，誕生於中學與大學校園的「紅衛兵運動」，無疑是我們理解文革群眾運動的一個窗口。

西方學界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研究始於1960年代後期，到1980年代已經蔚為大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李鴻永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西方學界關於紅衛兵運動的研究，以精英政治為中心的歷史研究與書寫範式，將群眾運動作為研究論述的重點。他們的理論結晶是主導西方學界近三十年的「社會衝突理論」。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1978)、駱思典 (Stanley Rosen) 的《紅衛兵派性與廣州的文化大革命》(*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1982) 和陳佩華的《毛的孩子：紅衛兵一代的個性發展和政治積極性》(*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1985) 等。這些論著一反傳統地以精英政治為中心的歷史研究與書寫範式，將群眾運動作為研究論述的重點。而他們的實證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理論結晶，是主導西方學界近三十年的「社會衝突理論」。

進入1990年代中後期，一部分新生代中國學者也開始將文革研究的視角轉向群眾運動。近十數年來湧現出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1999)、唐少杰的《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2003)、卜偉華的《「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2008) 和印紅標的《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2009)，等等。這些論著要麼直接秉承「社會衝突理論」，要麼受到「社會衝突理論」的極大啟發，視角新穎，見解獨到。中國本土對文革專題的研究由此別開生面。

然而，人類對客觀世界的探求是沒有止境的。這種探求既包括對許多新的未知領域的開拓，也包括對許多現有認知的質疑和反思。關於中國紅衛兵運動的研究也不例外。筆者要向讀者推介的美國斯坦福大學資深社會學教授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的新作《斷裂的造反：北京紅衛兵運動》(*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以下簡稱《斷裂的造反》，引用只註頁碼)，就是一個西方學者近年來對紅衛兵運動研究的反思之作。

提到魏昂德在當下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更多地恐怕還是在社會學家中間。他提出的「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 理論，對於分析中國共產主義政體下的組織結構，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他主持了一系列關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重大研究項目，其中包括「中國轉型經濟中的政治與所有權關係」、「中國經濟轉型的社會學考察：組織結構、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的私有化與精英流動」、「中國農村的政權機構、親緣關係和家庭財富」等，並出版了許多這方面的論著。

其實追根溯源，魏昂德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是1978年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張春橋與上海一月革命》(*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當時他還是密西根大學的一位研究生。博士畢業以後，儘管他主要致力於當下中國社會問題研究，但文革研究一直是他揮之不去的情結。他曾對筆者笑談，他無法放棄對文革的研究，就像一個老酒鬼離不開酒。正是基於這份執著，他先後介入〈中國鄉村的「文化大革命」：空間概念、時間維度與人際關係影響〉(“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魏昂德的新作《斷裂的造反：北京紅衛兵運動》是一個西方學者近年來對紅衛兵運動研究的反思之作。魏昂德並不諱言，由於早年受到李鴻永等人的影響，他曾經是「社會衝突理論」的忠實信徒。

Human Impact”，2003）、《歷史學視野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2006）、〈政治運動中的不確定性及抉擇：北京紅衛兵派性的起源〉（“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2006）等著作的研究、編撰工作，並陸續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亞洲研究學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刊物上發表關於文革研究的專題論文。這些研究的洞見最終都匯集於《斷裂的造反》一書。

魏昂德並不諱言，由於早年受到李鴻永等人的影響，他曾經是「社會衝突理論」的忠實信徒（頁8）。按照這一理論解釋框架，人們的政治態度取決於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網絡關係。文革期間的群眾派性衝突，是衝突各方在文革前的現實處境的一種反映。一部分人由於是現存體制的受益者，因而總是千方百計地維護現存體制；另一部分人由於被現存體制邊緣化，因而總是希望通過改變現狀爭取更多的權益。因此，文革運動一來，這些人便形成了所謂的「保守派」和「造反派」。由此可見，文革前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平等是群眾派性衝突的社會基礎。「造反派」的出現意味着社會底層民眾對現存秩序的質疑和挑戰。

魏昂德原本只是想通過對北京地區紅衛兵運動的個案分析，進一步了解社會衝突是如何產生與如何擴散的，目的還是為了論證「社會衝突理論」的普適性。他之所以選擇北京，其一是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遠較其他

地區發達，大、中學生的數量也比其他地區大得多；其二是作為紅衛兵運動發源地，北京地區的紅衛兵運動起來得早，具有較大的影響和較強的典型意義；其三是北京地區的紅衛兵運動資料異常豐富且保存比較完整（頁8）。其實正是基於上述理由，北京的紅衛兵運動一直是中外學者關注的重點。然而與以往的研究側重不同，魏昂德更加關注的似乎是北京高校的紅衛兵。這顯然是因為經過1966年5至8月的短暫過渡之後，大學紅衛兵迅速成為北京紅衛兵運動的主導力量。1967年初以後形成的「天派」、「地派」兩大聯盟之間的對抗，也以「五大領袖」所在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地質學院等大學為中堅。以大學生群體——而非中學生群體、產業工人群體或其他社會群體——為主要考察對象，或許是導致魏昂德研究結論與眾不同的重要原因。

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魏昂德獨特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方法。據筆者所知，迄今為止中國學者研究文革，一般都採用非常典型的歷史學研究路徑，即以一個地區、一個時段、一個領域（如「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中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為考察論述對象，採用「編年史」與「紀事本末」體裁，對事態的發展做單一的線性描述。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魏昂德除了注重考察紅衛兵運動的線性發展之外，同時還重點考察了一些社會學家感興趣的話題，如文革前中國社會發展狀況和高等教育規模，北京各大學的分布狀況及其與中央

北京的紅衛兵運動一直是中外學者關注的重點。然而與以往的研究側重不同，魏昂德更加關注的似乎是北京高校的紅衛兵。這顯然是因為經過1966年5至8月的短暫過渡之後，大學紅衛兵迅速成為北京紅衛兵運動的主導力量。

魏昂德指出大學生中的派性問題很難用現有的社會政治學分析框架加以解釋。學生的派性身份認同是在急劇變化的外部環境與頻繁的相互碰撞中逐步產生的，絕不是簡單、靜止、僵化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概念可以涵蓋的。

各部委之間的複雜隸屬關係，大學校園內部的黨政組織結構與政治關係網絡，家庭出身與個人政治表現在大學招生環節、學生幹部任用環節、入黨入團環節以及畢業分配環節上的影響作用，等等。他從各大學的校史資料和其他史料中摘錄的與此有關的大量數據統計和圖表信息，往往被那些採用單一的歷史學研究路徑的中國學者所忽略。實際上，基於這些資訊所作的統計分析與分類比較，往往能夠有效地避免「以偏概全」的弊端。

魏昂德以「社會衝突理論」為最初的觀念預設。然而，在研究過程中的一些新發現卻使他逐漸對這個理論解釋框架產生質疑。概要說來，他的新發現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關於學生群體派性的起源與個人派性身份認同問題。魏昂德在閱讀北京各大學的「文革大事記」資料時，發現大學生最初的派性傾向普遍地始於1966年6月中旬工作隊進駐以後。而導致學生最初分化的誘因是對工作隊政策導向和行為方式的不同看法。他進而發現，進駐各高校的工作隊起初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政策導向。基於其行政歸屬關係（即上級派出機構）的不同及其領導人對中央指示精神理解的不同，進駐各高校的工作隊可以分為「激進型」、「保守型」和「混合型」三個大類：

「激進型」工作隊對學校舊黨委持全盤否定態度；「保守型」工作隊對學校舊黨委持完全信任態度；「混合型」工作隊則主張對舊黨委成員採取區別對待的政策。然而不論工作隊採取何種政策導向，其後果

都造成學生群體的分裂：在「激進型」工作隊進駐的高校，與舊黨委關係密切的黨團員、學生幹部和學生中的積極份子群體存在反對工作隊的傾向，而那些被舊黨委邊緣化的學生群體則存在支持工作隊的傾向。在「保守型」工作隊進駐的高校，不同學生群體的態度取向正好與上面的情況相反。而在「混合型」工作隊進駐的高校，學生則按人劃線，受到保護的舊黨委成員及其支持者擁護工作隊，受到打擊排斥的舊黨委成員及其支持者則反對工作隊（頁29-33）。

如果說這種初步的派性分野還與「社會衝突理論」相吻合的話，那麼7月下旬以後的發展則變得撲朔迷離。繼毛澤東對派工作隊的做法提出批評以後，「保守型」和「混合型」工作隊要麼迅速調整自己的立場，要麼被新的「激進型」工作隊所取代。這種沒有先兆的政策逆轉無疑使眾多與「保守型」和「混合型」工作隊合作的學生進退失據、無所適從。他們不得不根據新的形勢重新選擇自己的立場。由此，由校內原有組織關係網絡衍生的派別劃分和群體身份認同迅速被新的更為複雜的形態所替代。不同群體中的個人立場選擇發生了無規則的變化。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1967年以後出現的全市範圍的「天」、「地」兩大派對抗。因為無論是從其領袖人物還是從其團體成員的社會構看成，這兩大聯盟都具有很強的同質性。此外，從他們的輿論宣傳和實際行為也很難區分兩者之間誰更激進，誰更保守。兩派的政治傾向常常因爭議焦點的不同而發生錯位。

基於這些事實，魏昂德指出大學生中的派性問題很難用現有的社會政治學分析框架加以解釋。學生的派性身份認同是在急劇變化的外部環境與十分頻繁的相互碰撞中逐步產生的，此後又不斷地發生着變化。由此形成的錯綜複雜的派性格局絕不是簡單、靜止、僵化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概念可以涵蓋的（頁250-51）。

第二，「社會衝突理論」認為，加入「造反派」（或曰「激進派」）的都是原來被邊緣化的社會階層成員，他們的行為意味着對現存社會政治體制的敵視和反抗。然而魏昂德在考察少數學生的激進行為（包括衝擊中央政府機關的行為）時發現：在「中央文革」介入以前，學生的激進行為是有限度的，而且在本質上是防禦性的。激進行為的誘因是工作隊的錯誤做法（頁67-87）。

如前所述，三種類型的工作隊在對待學校舊黨委的政策上存在顯著差異，然而，他們對那些反對自己的教師、學生都採取堅決的打壓政策。因此各校都有一些人被工作隊定為「反革命」、「右派份子」或「政治扒手」。其實這些人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階級異己份子」。例如地質學院「東方紅」頭頭朱成召、北航「紅旗」頭頭韓愛晶、北師大「井岡山」頭頭譚厚蘭都是黨員「調幹生」和學生幹部，清華「井岡山」頭頭蒯大富也是學生中的政治積極份子（北大的聶元梓是毛澤東欽定的「革命派」，因而沒有人敢把她打成「反革命」）。他們與工作隊產生摩擦並最終淪為工作隊的打擊對象，完全是前面所說的錯綜複雜的形勢

造成的。因而在1966年8月工作隊撤離前後，這些學生是否獲得「平反」，是決定其所在學校運動發展走勢的關鍵因素。如果工作隊及其上級願意為這些人平反，學生運動就會止於校內；如果工作隊及其上級不願意為這些人平反，學生運動就會向校外發展。

地質學院和北航屬於後一種情況。究其原因，地質學院直接隸屬地質部，工作隊也是由地質部派出的；北航直接隸屬國防科委，工作隊也是由國防科委派出的。這兩個部委的領導人為了避免被追究領導責任，在運動初期指示工作隊力保舊黨委。在關於工作隊的爭議發生以後，他們又極力庇護工作隊。當其他學校的工作隊紛紛表示願意接受學生批判、願意改正自己的錯誤時，地質學院和北航的工作隊則表現出強硬的姿態。兩校部分學生為了獲得平反，多次赴地質部和國防科委請願，均遭到兩部委領導的冷落。於是部分學生與工作隊的對抗便逐步升級為與兩大部委的衝突，最終發生了學生衝擊部委機關、查抄「黑材料」的事件。由此可見，學生的激進行為與這兩個部委領導層的自私考量與官僚主義做法有關。其實只要應對得當，這種矛盾衝突是不難解決的。

魏昂德還指出，兩校部分學生前往地質部、國防科委申訴、請願，所採用的依然是正常的組織關係路徑。其次，他們不惜採用武力手段衝進機關大樓查抄「黑材料」，其終極目的也無非是想摘掉「反革命」和「右派」帽子。前一個行動實際上反映了學生對工作隊上級領導機

魏昂德指出，學生前往地質部、國防科委申訴、請願，反映了他們對工作隊上級領導機關的信任；採用武力手段衝進機關大樓查抄「黑材料」，則反映出他們對現存體制的認同。所以說，「社會衝突理論」對「激進」行為作出的定性是錯誤的。

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本質上不是甚麼「造反」，而是在「中央文革」的鼓譟和操縱下為毛澤東個人「清君側」。魏昂德得出的推論是：文革期間的群眾運動並不是一場真正獨立的群眾性社會運動，而是官僚政治體制架構下的瞬間性的群眾政治參與。

紅衛兵向最高當局表示效忠。



關的信任，後一個行動則反映出他們對現存體制的認同。所以說，「社會衝突理論」對「激進」行為作出的定性是錯誤的（頁26、172）。

第三，關於「中央文革」（背後是毛澤東）介入後學生運動的激進化問題。魏昂德注意到，1966年10月以後由於「中央文革」的介入，北京的紅衛兵運動確實向着激進的方向發展，直到1967年初實施全面「奪權」。然而他對這種「激進化」發展的本質內容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激進」的表象背後發揮主導作用的，其實依然是長期流行的正統觀念。激進的學生向各級黨政機關「奪權」，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為了佔有權力，而是為了向最高當局表示效忠。他們不是企圖從根本上推翻現存的社會政治體制，而是要清除所謂的「修正主義份子」和「階級異己份子」，從而使現存體制變得更加穩固，更加持久。用一句中國人更熟悉、更容易理解的話來說，這場運動「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如果沒有黨內高層的內部紛爭，就不會有這樣一場紅衛兵運動。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本質上不是甚

麼「造反」，而是在「中央文革」的鼓譟和操縱下為毛澤東個人「清君側」。一旦「激進化」的矛頭指向「中央文革」，立即會遭到最高當局的鎮壓。中學紅衛兵中的「聯動」（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和大學紅衛兵中的朱成召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證。魏昂德由此得出的推論是：文革期間的群眾運動並不是一場真正獨立的群眾性社會運動，而是官僚政治體制架構下的瞬間性的群眾政治參與（頁173、259-61）。

以上三個問題的探討，已經足以顛覆原先的「社會衝突理論」解釋框架，以及由此衍生的「兩個文革」說。然而魏昂德的研究成果並不僅限於此。北京紅衛兵運動中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是，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是因為甚麼原因、在甚麼時間、以甚麼方式結束的？而要解答這些問題，就不得不首先回答另外幾個重要問題：為甚麼在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以後，北京紅衛兵會分裂為全市性的「天派」和「地派」？為甚麼「五大領袖」在其他問題上對「中央文革」言聽計從，對其多次提出的「大聯合」倡議卻充耳不聞？為甚麼兩派對抗得以長期延續而且不斷升級，直至導致大量人員傷亡和國家財產損失？

概要說來，魏昂德對「天」、「地」兩派的成因的解釋是：第一，兩派的形成與「五大領袖」之間的個人競爭有關。這種競爭先是表現在1967年1月北京市「奪權委員會」的組閣問題上，其後又表現在2月「首都紅代會」的組閣過程中。「五大領袖」之間互不服氣、相互拆台，最終使得個人之間的意氣之爭逐漸演

化成校際之間的派性對抗。第二，兩派的形成與各校「奪權」後的校內政治有關。「五大領袖」依仗「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的寵信，在各自的學校內大權獨攬、專橫跋扈，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誰要是有些甚麼不同意見，馬上會被戴上各種「反動」的帽子，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種做法與學校舊黨委和工作隊毫無二致。那些受到排擠、打壓的少數派當然不會輕易屈服，因為如果不進行抗爭，就等於默認那些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反動」帽子。而這些「反動」帽子輕則意味着喪失個人發展的機會，重則意味着坐牢或殺頭。當校內少數派意識到自己勢單力薄時，便向校外勢力尋求同盟者。其結果便是全市性的兩大聯盟的出現(頁203-22)。

在解釋「天」、「地」兩派紛爭為何得以長期持續的問題時，魏昂德指出在極權政治模式下，消除紛爭、實現和平的辦法只有兩個：其一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其二是獨立的第三方強勢介入，用武力手段迫使兩派達成聯合協議，解散派性組織。其中第一個辦法無法奏效，是因為當時「天」、「地」兩派在全市範圍內旗鼓相當、勢均力敵，誰也無法一下子吃掉對方。另一方面，由於兩派同出一源，「五大領袖」都是「中央文革」的寵兒，所以「中央文革」也不願意看到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結局。因而，不但全市範圍內兩派問題得不到解決，各校內部的兩派問題也得不到解決——因為校內少數派常常以其校外同盟者為奧援，從而獲得必要的財力、物力支持(頁222-52)。

第二個辦法在很長時間內沒有採用，顯然是由於「二月逆流」、「青海事件」、「武漢兵變」等突發事件的頻繁出現，使毛澤東擔憂在所謂「復辟逆流」發生時失去反擊的手段，因而不願意過早地解散儘管相互之間爭鬥不休、同時又都對他個人絕對效忠的紅衛兵組織。等到1968年夏天，隨着全國絕大多數省份紛紛建立了「革委會」，中央和各省的權力格局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大體實現，他便無法繼續容忍紅衛兵派性鬥爭干擾其重建秩序的努力。於是他以清華「百日大武鬥」為突破口，採用武力手段脅迫兩派頭頭解散組織，很快就結束了紅衛兵運動(頁27、245-47)。

以上是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對魏昂德新書中的主要觀點所作的概述。在沒有對其他地區、其他社會階層的文革群眾運動進行充分的實證研究前，我們暫時很難判斷這些新見解的適用限度。儘管如此，魏昂德將社會學研究中常用的統計分析與分類比較方法運用到歷史問題的研究中，值得我們借鑒。同時，他對工作隊的不同類型及其影響作用的細緻分析，關於紅衛兵派性成因和個人派性身份認同問題的見解，對部分學生激進行為的本質判斷，關於「中央文革」操控學生運動的方式與路徑的論述，以及關於「天」、「地」兩派衝突產生與延續的解釋，無疑都將直接或間接地促使我們對文革群眾運動的本質和其他相關問題做出新的思考。

董國強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魏昂德將社會學研究中常用的統計分析與分類比較方法運用到歷史問題的研究中，值得我們借鑒。書中的細緻分析，無疑都將直接或間接地促使我們對文革群眾運動的本質和其他相關問題做出新的思考。